

黑马

系列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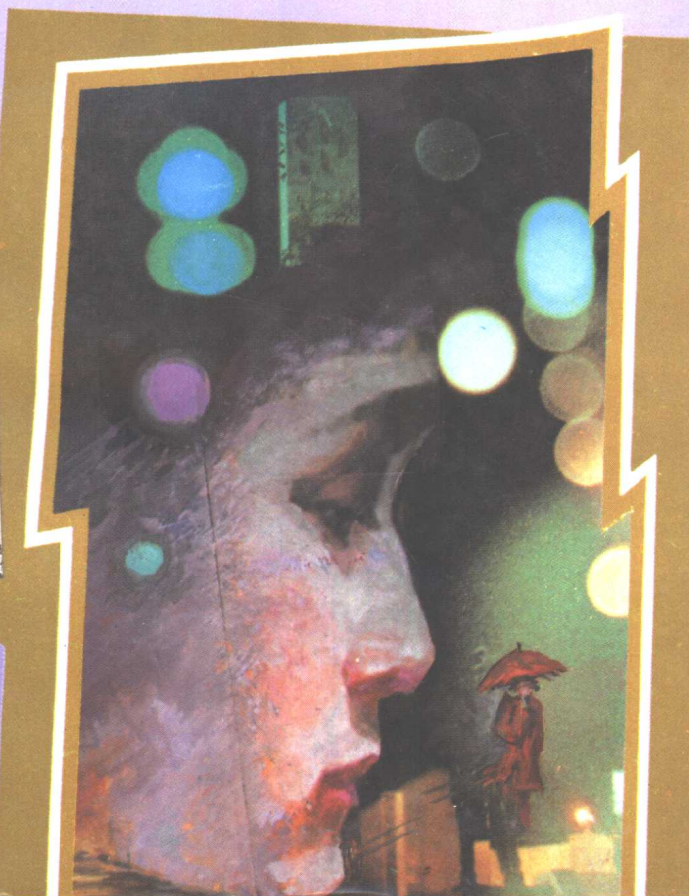
城市玩笑

李元胜 著

CSHI WANXIAO



重庆出版社



黑马系列小说

I24/5 /
106

66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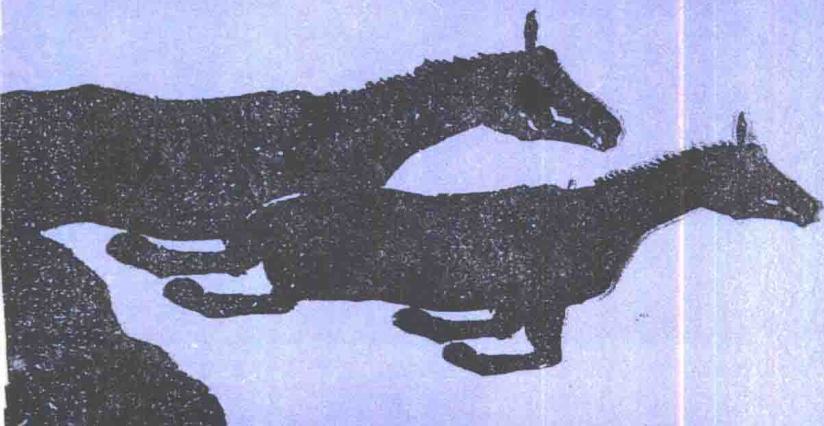
城市玩笑

chengshi

wanxiao

李元胜 著

重庆出版社



李元胜 著

城市玩笑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电力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9.375 插页:4 字数:150千

1994年11月第一版 1994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2000

ISBN7-5366-3060-4·I·548

定价:9.85元

内 容 简 介

小说主要人物是几个某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背景是80年代中期的城市生活。众所周知,这是一个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化的年代,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写法,试图在这个戏剧化的时代气氛中,揭示过渡时期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并为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旧体制中的机关生活送上一曲挽歌。

主人公韩霜林出生于一个卑微的市民家庭,由于人格成长时期形成的难以解脱的自卑,他把分配到机关工作看着是莫大的荣誉,同时渴望打入权力阶层。具体到这个夏天,他使尽全身解数企图成为一个科长,最后却意想不到地得到一个辛酸的玩笑式的结局。

书中通过主人公的眼睛和耳朵,也写了他的另外几个同学。王承铭才华横溢,但却因为内心的矛盾,既想逃离旧体制的禁锢,又不愿在商业化的城市中从小事做起,游戏者最后被游戏所困,本想超脱却坠入最惨不忍睹的世俗生活。孙忆敏的野心和世故甚至超过了韩霜林,她在对机关感到失望的时候便毫不犹豫地弃之而去。



小 传

李元胜，男，1963年生
于四川省武胜县，1979年毕
业于武胜县中学，1983年毕
业于重庆大学电气工程系，
现在重庆日报从事编辑工
作。1981年起尝试写诗，近
年来也写随笔和小说。

2003

那个春天，我的计划是把自己弄成科长。由于这个念头很强烈，我走在这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感到擦身而过的人一个个脸色严肃，行色匆匆，全是像我这样想当科长的人。

这使得我警惕起来。

当然这也许仅仅是庄子笔下的“鸱得腐鼠”的心理。鸱怕别人夺其腐鼠，故惊叫。不同的是，我尚处于目视“腐鼠”而无缘得之的阶段，所以只是暗自惊惶，并不敢出声惊叫。

读者诸君看到这里，一定会感到奇怪，你说的究竟是哪个时代的故事？是二十年代上海公司里的旧式职员？还是忙碌在当年英国写字楼里的所谓的精致的小人物？

不过，我写的的确只是我自己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段经历，当时我从大学中文系分到某市局组织处已经五年，作为一名勤勤勉勉的职员，成天和灰尘蒙蒙的档案和无休无止的报表打着交道。

我个人对外界的一向漠不关心以及工作的多少有点封闭的性质，使我对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

的变化一无所知。我全部的生活就是组织处那灯光有点暗的办公室。

当华灯初上，我结束了一天的伏案工作，揉着有点酸痛的眼睛，站在不断有一种讨厌的小虫子（是那种把自己装在奇怪的黑色的布袋子里的虫子）落下的法国梧桐树下，等着公共汽车晃晃悠悠地把我带向这个城市的另一个角落时，我就会感到一种惶恐。

时间的洪流正用我最不喜欢的东西越来越紧地把我裹起来，就像一条被污染了的河，用它那些发着怪味的泡沫包围着我，推着我向前走，而且丝毫没有一点改变的迹象，这实在令人沮丧。

我的焦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堆积起来的。

我的要求不高，我只需要成为一个科长就行了。当上科长，就可以在下一轮分房中名次靠前，从那幢破旧的老楼里搬出来，甚至有可能在家里由单位装上一部电话；就可以在全局职工大会后留下来——因为局长老是这么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请各科室负责人以上的干部留下来；可以在女朋友面前扬眉吐气，不被骂作该死的小职员；就可以在工资表的数字上加上一小截；可以在同学或老朋友聚会时得到一点羡慕或恭维；可以不必装出目瞪口呆的样子听科长老蒋讲新闻；可以

不必听同事张大姐每天一次的语重心长的教导
.....

总之，生活在这里分岔了，我就会踏上一条崭新的路。

对，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城市里的人可分为两种，当上科长的人和没当上科长的人。

所谓一个人的天花板恰恰就是另一个人的地板。

当上科长的人总之要少一些。他们是城市的幸运儿，他们拥有冬天里的阳光和夏天里的林荫。他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只要没被撤下来，他们甚至可以一直亮个通宵。

这就是城市的游戏规则。

我已经厌倦了小职员的生活，一直梦想做游戏的主人，现在，游戏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开始，怎不叫我时而心花怒放，时而疑虑重重，像一个一输再输的赌棍，终于有了一次席卷而来的机会那样全神贯注，无暇他顾。

问题是，这一切还得干得更好更巧妙才行。

我对自己的心计本来一直感到满意，现在，意识中的无数个轮子飞快地转动起来，满脑袋里充满了围绕着这个大念头的种种小主意，就像有一群久雨初晴的蜜蜂，兴奋地四处乱飞。引导我在这

个雨水味很浓的春天里四下诡诡祟祟地活动。

这样的忙碌一直持续到了五月的某个早晨，我从一个神秘的梦中醒来，睁着眼睛，瞪着有些陈旧的天花板，一只小蜘蛛正在天花板一角狡猾地织着就要完成的小网。

我看着看着，仿佛得到谁的许诺，感到一阵轻松，似乎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了。

昨夜的梦就像电视片一样又在我眼前放了一遍。

其实，这个梦的开始部分我很熟悉，无非是和数不清的人群一起挤在一个无比空旷的广场上，广场的中央是两根临时竖起来的竹竿，上面扯着一匹大白布，大白布的两面都挤满了人，他们不分男女老少，一律仰着头，好像等待着什么。

我一边做梦一边想，这是梦，骗不了我，这个情景我5岁的时候就知道了，无非就是县城的人们在吃罢晚饭后聚集在县城唯一的广场上，等着看《地道战》嘛。

但是梦比我狡猾，它用这个非常真实的场面让我进入后，却安排出千奇百怪的故事来。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梦都要从这个广场的场面开始。

自然，这个梦也是从广场开始的，但是就在我挤在人群中等着的时候，一阵风吹来，身边的人就

像纸片一样被吹得满天都是，而且越来越小。只有我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处，我假装没有注意到身边有什么变化，只用眼角瞟了一下广场的角落，风就是从那里吹出来的，我事实上已经看到了一个老式的鼓风机，就是旧式农村用来吹稻谷的那种木制风车。

我意识到，这就是梦的中心，一切的场景、人物和对话都在源源不断地从那里飘出来。

就在我庆幸自己找到了梦的秘密的时候，眼前一阵昏花，广场和风车都消失了。我又只是个穿着个背心，在裤子的口袋里塞满了李子的小孩子，正眼巴巴地看着一队胸前戴着大红花的新兵在那里集合。我唯一的愿望是希望他们在解散之后，会有人不小心地把大红花落在地上。这可是一件在孩子中值得夸耀的东西。

但他们没有解散，一个当官模样的人从一幢房子中走出来，让他们反复做了几次立正、稍息后，说：“现在我们来唱一首革命歌曲，由我来起唱。”他伸出毛乎乎的手臂在空中胡乱捣了几下，然后在脸上挤出了一种奇怪的有点做作的亲切：“老乡”。随后那亲切消失了，换上了有点傲慢而凶狠的表情，直愣愣鼓着的一对眼睛瞪着他的部下们，他的手猛朝下一劈，吼了声：“给我唱！”于是，新兵们全部把头往下一点，在脸上挤出了那种奇

怪的有点做作的亲切，说了声“老乡”，然后开唱：“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这是《智取威虎山》中的一个唱段。

梦进行到这里，我再次发现，这其实不是梦，而是我早年目睹过的早已忘记的片断，居然又被风车吹了出来。正在这样想的时候，我又发现自己竟站在那个军官的位置上，下面站着一群莫名其妙的男女，看样子他们正等着我讲话，我只好严肃地清了清喉咙，说：“好罢，就讲到这里，完了。”

于是他们一阵鼓掌。

这个梦我能记起的就是这样。

我对梦一直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一般来说，我的梦比我的生活更紧张、凶险而浪漫，我在梦中经历了仇杀、登山冒险和猎艳。但是我在生活中没有需要追杀的敌人，没有登山鞋，也没看见过梦里那些惊心动魄的美人。

我想，梦是不是一直在提示，我的生活太平庸了，像一片光秃秃的坡地，没有任何值得仔细一看的东西。

但是我固执地反对梦的这种看法。在一个城市里面，你能指望什么。我们都在一架庞大的机器上生存，看似平庸，其实充满了危险，一不小心，你就会落到齿轮的缝隙里去，被碾得粉碎。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拼命向上挤，朝更安全更舒适的地方

挤。

因此,我觉得这个用现实材料做成的梦是一个预言,特别是它的结尾,简直表达得十分露骨了。

看来,成为一个科长的日子已为期不远,我不禁激动得哆嗦了一下。

2

我准备开诚布公地谈谈我的过去,但愿话题不至于扯得太远。

我有时觉得,好像我一直就有一个当个科长组长什么的愿望。这当然仍然属于追根溯源之类,我可以举出例子,比如可以从我幼年的愿望说起,还可以这样打比方,如果说,这个梦在多年后的今天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的话,那么在那时,就已经有了冒出土的幼苗。

我的母亲如果还在世的话,她会帮我回忆得更清楚些。

不过,在我读完高中,回到提篮巷,从母亲断断续续的唠叨中,我曾得到了如下材料:

就在我还在提篮巷幼儿园甩着小手跑来跑去

的时候，有一次，我说什么也不愿意去上幼儿园了。母亲问我为什么不去，我很生气地说，阿姨不要我当小小管理员。

手里拿着一本红宝书的母亲，站在门口，急得直招手，可我却一边晃着脑袋，一边朝后面退，最后干脆钻在桌子下面不出来了。

什么叫小小管理员，着急的母亲也弄不清。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不把我送去幼儿园是不行的，她所在的那个街道小厂开会，每个人都要结合学习毛主席语录，交待心里的活思想，去晚了可是个态度问题。

不由分说，母亲便硬生生地把一边哭一边拼命扭着身子的我拖着拽着弄到了幼儿园，一问阿姨，才知道，幼儿园里每个班每天都选一个孩子当小小管理员，让他为其他孩子发玩具。我从来没有当过小小管理员。

阿姨为什么不让我当小小管理员，没人知道。

我进小学的第一天，就按照母亲的指示，从家里扛了一个扫把去，每天一早就去教室打扫清洁。这样的表现真让教师又高兴又纳闷——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就这么懂事。

班主任是一个细心的人，一天放学后，在闹闹嚷嚷往外挤的孩子中把我叫住了。

“告诉教师，你为什么每天都来打扫教室？”

“我——我要表现好。”

“为什么要表现好。”

“我想当小组长。”

“咦，为什么你想当小组长呢，霜林。”老师想，这孩子还有点地位观念呢。

“我妈说了，我爸爸没出息，活了一辈子，除了在车间里受组长的气，就没干过别的。”

就由于这番谈话，班主任在教研室里感叹了好几回，说，现在真难分清哪个孩子思想是真进步还是假进步呵。

我终于没当成小组长。

读初中时，我时来运转，由教语文的教师点将，当上了语文科代表，但不久那个教师调走，新教师另选了一个同学为自己收作文本子，我心里不痛快了很久。

接下来，在高中和大学，我一直毫无表现，从未担任过学生干部工作。在大学里，我已不像以前那样幼稚了，我根本对担任学生干部毫无兴趣，我认为真正能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是，在走上社会以后的表现。学校是什么嘛，无非是个中转站，我们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集中一下，又分散到五湖四海中去。在这里能挣什么呀，还不如多学点东西。

我这么总结了一下，好像理由已经很充分了。

对,我从小到大就是梦想着当个科长组长似的。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们一下子相信了,那可就上当了。一个人从小到大,有多少条发展的线索?我敢说,如果我碰巧不是组织处的小科员,而是一个歌星的话,一个采访我的记者,肯定会在我的如实的关于童年的回忆中,发现音乐一直是我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尽管,那个时代的收音机里,成天只放着革命样板戏的唱段。或者,如果我碰巧又做了许多好事碰巧又有一大笔钱可以捐献给灾区的话,那从我的少年故事中,完全可以找到足够作一次演讲用的材料,你可以看到一个当代的理想主义者的完整的发展历程。或者,如果我非常不碰巧地成了一个坏蛋——盗窃国家财产的大贪污犯,一个犯罪学家也可以从我的真实经历中找到对他有用的材料。

虽然如此,我还是乐意把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陈列在一起,它们虽然不能说明什么,但也确实是我在这个早晨的一点真实的联想。

3

迷迷糊糊想到这里,我翻了一个身,准备再睡一会儿。

因为翻身，我的手在空中软软地划过一道弧线，在它重新落到床上的时候，碰到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似乎还有毛发。

这把我吓了一跳。

我脑袋里那些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片断轰的一声四散飞走。要是这时有人看见我的眼睛，他肯定会发现一对瞪圆了的球。

这是怎么回事，我旁边居然睡了一个人！

我好不容易冷静下来，这才看清楚是一个女人，因为她的长发就随随便便放在我的枕头上，脸朝着另一边，好像她还在酣睡中，并发出快乐的磨牙声。

而且她肯定不是我的女朋友周可可，因为可可是短发，而且，就是周可可也从未在这里过夜。

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想起过去读过的一本书，那里面讲的是外国官员在莫斯科经常遇到的一件事，就是清晨醒来，发现自己床上有一个陌生的苏联姑娘。书中说，这是克格勃的常用手段，目的是拍下一大堆照片或摄下录像，好让这些官员就范。据说，许多英武的军官既不愿从此听命于克格勃也不愿背着丑闻回国，只好拔枪自杀。其中只有一个小国家的国王是一个例外，据说，他看完克格勃提供的录像后，兴冲冲地问，可不可以拷贝一

份给他带回去，让他的子民们看看，他们的国王是怎样征服俄罗斯姑娘的。

不过，我感到纳闷的是，我这样的小职员值得谁这么慷慨地牺牲一个姑娘么？

我向四周看了看，并无什么镜头和闪光灯。

我想把身体支起来，看看是谁家的姑娘，她怎么敢就这样放肆地睡在我的床上，可是我的头却疼得像要裂开似的。这疼痛提醒了我，好像昨晚确实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我哼了一声，身体好像也不听使唤，重重地摔回了床上。

这一下把身边这个女人弄醒了，她呻吟了一声，好像声音是从一口深不可测的水潭里冒出来似的。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个只穿着薄薄的内衣的女子从床上缓缓起身，看着她用还算纤美的手把瀑布似的黑发朝脑后一放，然后轻轻滑下床，并不看我，便径直朝床边的一个木椅走去，那里放着一些零乱的女人的衣物。

她美丽的背影使我怦然心动。

我使劲用指甲掐了掐自己，很痛，说明这并不是什么梦境。

看样子，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有一个